

ZHONG GUO SHANG YE JING JI SI XIANG SHI

ZHONG GUO SHANG YE JING JI SI XIANG SHI

● 中国商业 经济思想史

蒋建平 柳思维 朱坚贞 曾赛丰 编著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

蒋建平 柳思维
朱坚贞 曾赛丰 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

蒋建平 柳思维 编著
朱坚贞 曾赛丰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15.875印张 408 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50 定价：7.20元

ISBN 7-5005-1064-0/F 1000

前　　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当认真地总结、分析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加分析的全盘继承和彻底否定，毫无疑问都是完全错误的。

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们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清理工作。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坚强的毅力，甚至不惜耗费毕生的心血，在既山花烂漫又荆棘丛生的祖国文化园地中辛勤耕耘。他们的劳动终于没有白费，一大批研究祖国文化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军事思想史》等，相继问世。

然而，当我们喜庆丰收的时候，却又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传统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百花盛开，唯独商业经济思想领域一枝凋零。历史在中国商业经济思想领域留下的，决非空白！例如，《诗经》、《礼记》、《易经》、《尚书》等成书较早的经典文献中，就都有不少关于商品交换的记载和议论。《尚书·大传》记载说，舜因“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传虚卖贱，于是债于传虚”。由此看来，早在远古的传说时代，人们就已知道自觉地利用价值规律了。《六韬》记载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在建造大城时，特意在其中设立9个专门进行贸易活动的“市”。由此可见，早在商代时，人们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就已有一定的认识了。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我国有文字可考的商业活动至少也有数千年历史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常常与商品、货币

打交道，自然会不断地产生经验的积累、认识的深化、问题的提出、观点的争论、思想派别的形成。而这些，正如同涓滴积溪流、汇江河、归大海一样，又自然会促使中国商业经济思想从无到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因此，可以断言，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决非荒漠，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未能认识它的“庐山真面目”罢了。

但是，在肯定中国商业经济思想不是荒漠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政治、军事、财政、医学、农学等相比，商业经济思想实在要逊色得多。几个基本的事实是：至1840年鸦片战争止，中国没有一个专门研究商业经济并以此而闻名于世的学者，没有一本专门研究商业经济的著作，为商人著书立传，司马迁是空前的唯一一人。平心而论，中国商业经济思想是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没有能够获得充分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自然经济从根本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商业经济思想缺乏发展的动力和基础。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是奴隶制时期短，而封建制时期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家掌握了一部分土地，自耕农民也掌握了一部分土地，但绝大部分土地是掌握在封建地主手中，而且国家和地主的土地也大多分散出租给农民耕种，这就决定了中国很早便成为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种自然经济形式有着高度的自给率，既不需要购买，也不亟盼出卖，几乎完全阻隔了与市场的联系。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主要条件，自然经济阻碍了市场的扩大，从而也就在根本上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此外，历代封建王朝顽固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能不说是中国商业经济思想不能充分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重农抑商（重本轻末）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最早是商鞅、韩非等法家提出来的，但后来却成为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思想武器的历代封建王朝相袭不衰的一项国策。重农抑商政策在封建社会前期是起过进步

作用的，但到封建社会中后期，特别是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来越突出了。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不仅直接打击和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而且还使得土地在社会财富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从而刺激商人产生经营土地的兴趣，导致商人购田买地，成为商人兼地主，甚至进一步由地主上升为官僚，产生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有现象：商人、地主、官僚三位一体化。这都是极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从而也是极不利于商业经济思想发展的。

另外，中国商业经济思想不发达，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是重义轻利的。从孔、孟的言论看，儒家并不抑商，但他们重义轻利的思想内核是与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因为商品经济天生就是趋利的。由于封建统治者尊崇儒学，把儒学定为开科取士的标准，使得人们普遍接受了重义轻利的思想，因而导致鄙视商人和商业的传统观念的形成。人们普遍鄙视商人和商业，政府又顽固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两股重大的压力，就使得工商业者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下卑微。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阶层自然很难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也很难在统治阶级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自然很难使自己的经验和思想得到整理、总结、流传。这对于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自然是极为不利的。

二

商业经济思想是商业经济的衍生物。只要有商业经济存在，就会有商业经营的经验积累，就会有对商业经济的认识出现，从而也就会有商业经济思想的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商业经济思想虽然已达到的水平不高，但其历史却是相当悠久的，因为中国商业经济的产生很早。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漫长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产生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商代和西周，也包括远古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人们对商业经济的主要范畴——市场和价格，对工商业和农业的关系，都已有所认识。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还是零星的，还没有产生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观点，也没有出现有系统思想的代表性人物。

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包括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秦代和西汉。这一时期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对商业经济有系统认识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春秋时期的管仲、晏婴、孔丘，战国时期的商鞅、韩非，西汉时期的贾谊、晁错、司马迁、桑弘羊。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在商业经营管理方面有成功经验的著名富商大贾，如范蠡、白圭等。这一时期，也产生了许多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系统的商业经济思想，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由商鞅最早系统提出，而由韩非进一步发展和全面阐述的重农抑商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的经济发展，对后世的经济理论发展，对后世的商业经济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迟滞时期：这一时期，从西汉末年起，至明初止，延续的时间最长。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式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正处于上升时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制定并严格推行重农抑商政策，由于中央集权制在各个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延伸，商业经济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力，从而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也举步艰难，起色不大。从表面看，似乎这一时期也有不少著名的代表人物产生，也有不少系统的商业经济观点提出，但究其实质，新意不多，特色不大，水平不高，其总体水平并没有比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高多少。

加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包括明代和清代前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出现许多微妙的变化：封建经济发展趋缓，自然经济的局部解体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显加快，资本

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萌芽。社会经济的这些微妙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很自然地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由此而导致了一大批卓越思想家的产生和一系列著名论点的提出。丘浚、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王源、蓝鼎元等人的观点，集中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他们的许多著名论点的提出，犹如投进平静湖水的石子，打破了商业经济思想领域一千多年的沉闷，激起了令人可喜的波澜，尤其是蓝鼎元的对外贸易思想，言前人之所未言，论前人之所未论，开一代之先河，更是光芒闪耀，发人深省。

突变时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动异常激烈。外国资本主义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用商品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与此同时，自然经济开始大规模地迅速地解体，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开始逐步产生；商品经济第一次脱离小商品经济的轨道而迅猛发展；商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而真正确立，并获得社会的普遍重视。社会经济的激烈变动，使得思想界波澜起伏。郭嵩焘、王韬、黄遵宪、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一大批思想家应运而生，“商本论”、“劝工重商论”、“商纲论”、“商战论”、“振兴商务论”等一系列震聋发聩的议论相继提出。

三

如果对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稍作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它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近代时期，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发展比较迅速。明、清时期，也有较明显的发展。但是，在东汉至元代的漫长时期中，它的发展速度是相当缓慢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在发展时期上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平衡的状态，乃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商业经济思想的直接基础和发展动力是商品经济，而

影响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然经济，二是处理农商关系的政策，三是中央集权制。当自然经济的束缚削弱，政府对工商业的政策宽容，中央的官工商措施松弛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快，从而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就迅速，反之则慢。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是，宏观的内容较多，而微观的内容极少。一部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几乎都是农商关系的理论，而外贸理论、市场理论、价格理论、货币理论等都不多见，商业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理论则更是寥若晨星。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样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问题很明显，在自然经济的重重束缚和政府顽固的重农抑商政策下，小商品经营者的资金积累十分困难，发财无路，致富无门，更何谈经营管理的经验！商人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极为低下，为知识分子所不耻，又有谁来为他们树碑立传和总结经验！

总之，是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坎坷命运和不平衡发展。

四

写出一部《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补上传统文化研究的这一空白，是我们多年来的夙愿。

我们是从1986年底开始啃《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这一坚果的。4年来，由于史料太缺，可以利用的现成的研究成果不多，加之我们本身的理论水平、史学知识、写作经验有限，因而颇费力，先后三易提纲，两易初稿，几经反复。今天，我们虽然把它交给了读者，仍感不如意之处甚多，错误也可能会有不少，敬请多多批评指正。

原提纲有第十一章“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业经营管理思想”，后因资料太缺而未果，终成遗憾。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

史》、赵靖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和《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讲话》、林文益著《中国商业简史》、吴慧著《中国古代商业史》、叶世昌著《中国经济思想简史》、张守军著《中国历史上的重本抑末思想》、李浚源等著《中国商业史》、侯厚吉等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在此谨致谢意。

作 者

1989年10月14日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产生	(1)
第一节 中国商业活动的起源和初步发展	(1)
第二节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萌芽	(13)
第三节 西周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	(20)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28)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活动的迅速发展	(28)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38)
第三节 管仲、晏婴、子产的商业观	(43)
第四节 儒家的商业经济思想	(52)
第五节 墨家和农家的商业经济思想	(63)
第六节 法家的商业经济思想	(67)
第七节 《周礼》的商业管理理论	(75)
第八节 商业经营管理理论	(81)
第三章 秦汉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91)
第一节 秦汉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	(91)
第二节 贾谊、晁错的商业经济思想	(101)
第三节 “轻重论”中的商业经济思想	(107)
第四节 司马迁及《史记》中的商业经济思想	(118)
第五节 桑弘羊的商业经济思想	(128)
第六节 王莽、王符等人的商业经济思想	(138)
第四章 三国魏晋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149)
第一节 三国魏晋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	(149)
第二节 三国魏晋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154)

第三节	傅玄的商业观	(157)
第四节	贾思勰的商业观	(160)
第五节	鲁褒的货币观	(161)
第六节	南北朝时期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	(163)
第五章	隋唐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172)
第一节	隋唐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	(172)
第二节	隋唐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177)
第三节	刘晏的商业经济思想	(183)
第四节	陆贽、李翱的商业经济思想	(189)
第五节	杜佑、韩愈、白居易的商业经济思想	(197)
第六章	宋元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207)
第一节	宋元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	(207)
第二节	宋元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214)
第三节	李觏的商业经济思想	(226)
第四节	王安石的商业经济思想	(233)
第五节	叶适的商业经济思想	(244)
第六节	卢世荣的商业经济思想	(249)
第七章	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253)
第一节	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商业经济的发展	(253)
第二节	明清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258)
第三节	丘浚的商业经济思想	(264)
第四节	启蒙思想家的商业经济思想	(281)
第五节	王源的商业经济思想	(295)
第六节	康熙、雍正、乾隆的商业观	(302)
第七节	蓝鼎元的对外贸易思想	(311)
第八章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318)
第一节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时期的经济形势	(318)
第二节	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商业经济思想 综述	(325)

第三节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商业经济思想	(330)
第四节	汪士铎、冯桂芬的商业经济思想	(352)
第五节	王茂荫的货币理论及其对商业的利用	(359)
第六节	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商业经济思想	(365)
第七节	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商业经济思想	(375)
第九章	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387)
第一节	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时期的经济形势	(387)
第二节	洋务运动至戊戌变法时期商业经济思想 综述	(390)
第三节	曾国藩、郭嵩焘、李鸿章、张之洞的商 业经济思想	(393)
第四节	王韬、马建忠的商业经济思想	(411)
第五节	黄遵宪、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的商业 经济思想	(416)
第六节	何启、胡礼垣的商业经济思想	(433)
第七节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商业经济思想	(438)
第八节	严复的商业经济思想	(452)
第十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	(459)
第一节	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形势	(459)
第二节	辛亥革命时期商业经济思想综述	(465)
第三节	张謇的商业经济思想	(468)
第四节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商业经济思想	(475)

第一章 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产生

第一节 中国商业活动的起源和初步发展

一、原始社会末期商品交换的产生

(一) 原始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商业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反映商业活动的思想、理论的形成、产生和发展都是与商业活动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分不开的。研究商业经济思想，必须了解、研究商业。商业是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因此，研究商业的起源，首先又必须研究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

产品交换，即产品走出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之前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交换活动过程，其基础是社会分工。由于分工，产生了生产者生产的单一性与需要多样性的矛盾，人们之间才需要相互交换各自的产品。

人类社会最初是没有社会分工的。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社会生产主要是猎取自然界的天然物质。处于与自然等同状态的原始人，其生产项目主要是采集和渔猎。简单协作是基本的劳动方式，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什么剩余产品可以用来交换。

后来，由于狩猎工具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人们获得的生活资料也逐渐增多了。石器、骨器、装饰品日益丰富。氏族内部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自然分工，青壮年男子从事狩猎、捕鱼和防御猛兽，妇女从事采集食物、加工皮毛、缝制衣服等，老年人

及小孩做些辅助工作。

在母系氏族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人口的繁衍，形成了有特定布局的氏族聚居区域，不同的区域因自然环境差异，出现了产品多样化。“通过人所处的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①这样，近山者为猎人，近水者多渔夫。不同氏族部落之间客观上出现了交换其不同产品的可能性，而当生产的发展使生产物超出自身消费形成了若干剩余时，就把偶然的物物交换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从我国河南仰韶村的彩陶遗址和从甘肃属于仰韶文化的墓葬中，都曾发掘到作为装饰品用的海贝。陕西临潼姜寨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原始氏族村落遗址（距今约六七千年）也有贝饰的发现。贝不产于上述地区而产于沿海一带。在这些地区发现的贝多半是从别的部落辗转而来。

交换的前提是当生产物超出了氏族部落自身消费而有了一定剩余，再根据自己的需要，临时性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开始的时候，交换是以互相赠送礼物的方式进行的，主要发生在有一定血缘或亲缘关系的氏族部落之间；后来，也有的交换双方并不直接见面，只是把要交换的物品放在部落之间的中间地带，到时各自派人取送。所以，这种最早出现的交换还谈不到什么等价交换。但这种偶然的、稀少的、不计价的氏族或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对于促进社会分工的产生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氏族内部，由于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属于氏族公社公有的，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劳动还不是私人劳动，生产物也未成为私人生产物，社会分工也未产生，这些都决定了在氏族内部各成员之间还不可能发生什么交换关系。

（二）原始社会末期商品交换的产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1页。

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专门从事畜牧业的部落从其他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社会劳动的第一个划时代的进步。畜牧业的单独分离，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不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且使偶然的物物交换变成经常性的交换。

交换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新的分工的产生。在畜牧业单独分离并使物物交换经常化以后，原始手工业又逐渐与农业分离，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从轮制陶器和冶制铜器的出现开始的。手工业单独分离后，不但使物物交换经常化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但经常化，而且从近地贸易向远地贸易延伸。我国古代传说舜在没有受尧“禅让”之前，就曾“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①。《尚书·大传》也谈到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淮南子·齐俗训》也说：“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

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不但使部落之间的偶然的商品交换进一步经常化，而且使商品交换关系在原始公有制部落内部渗透。开始的交换是由部落的领袖掌握，在氏族部落之间进行。随着社会分工发展，生产力提高，产品增加，交换空间范围扩大，并且随着交换媒介物的相对固定，氏族领袖在交换过程中便习惯地把交换产品看成自己的私有物，逐渐出现了私有财产和私人之间的交换，并逐渐侵蚀着原始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正如列宁指出的：“遗产制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私有制则是随着交换的出现而产生的。已经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劳动的专业化和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是私有制的基础。”^②

① 《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133页。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在氏族公社内部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也逐步发展。固定的商品交换场所——市场也在私人之间商品交换日益正常的情况下出现了。古书记载：“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氏，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这也说明氏族公社成员有了私有财产后必须通过市场互通有无。

总之，从偶然出现的物物交换，到私人之间经常的商品交换的产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始社会末期商品交换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力要素优化组合的一种新的形式。它一产生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和奴隶制的产生，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

二、商代商业活动的勃兴

（一）夏代商品交换的发展

夏代以奴隶劳动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可用于交换的物质产品增多。在农业方面，由于夏代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历法——《夏时》、《夏小正》，能够利用季节、气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加之变水害为水利的能力增强，农业生产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有了剩余，酿酒由此便发明了。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在夏代也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发展，除陶器、铜器以外，木、石、骨、玉和纺织等手工技术也有了进步。不同部落的生产分工形式趋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多，为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在夏代，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是货币的产生。由

^① 《易·系辞下》。